

滨海遥远的过去

[苏]A.П.奥克拉德尼科夫著



滨海遥远的过去

(滨海边疆区古代史与中古史纲要)

[苏] 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 著

莫润先 田大畏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82年·北京

A.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ДАЛЕКОЕ ПРОШЛОЕ ПРИМОРЬЯ
Примор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59

内 部 发 行

滨海遥远的过去

(滨海边疆区古代史与中古史纲要)
〔苏〕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 著
莫润先 田大畏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510

1982年5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02 千
印数 1—6,300 册 印张 12 ½ /
定价：1.60 元

出 版 说 明

本书作者阿·巴·奥克拉德尼科夫(1908—)，是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总分院历史、语文与哲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区的考古研究。最近十多年来，奥克拉德尼科夫以介绍最新考古发现的名义，写了不少歪曲和篡改历史的文章，矢口否认老沙皇根据不平等条约强占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原本是我国的领土，否认那片广大地区和我国内地之间在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强调“远东各民族有着渊源极其久远的自成一体的文化”。

《滨海遥远的过去》一书，出版于1959年，是苏联公开反华以前的著作。书中所说的“滨海地区”，指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下游一带地方，即老沙皇强占的那片土地的东部，现在主要归苏联滨海边疆区管辖。奥克拉德尼科夫在这本书中，尽管散布了一些错误观点，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尚未否认“滨海地区”同我国东北乃至黄河流域之间有悠久的历史关系。所以，本书在详细介绍当地考古发现的同时，大量引用中国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并对当地和我国内地的考古资料进行比较研究。

本书开头就说：“远东居民古代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历史命运的复杂性，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历史条件，取决于他们同邻近的亚洲大陆各地和各国的联系。”接着又进一步强调，“远东诸部落首先同中国(它在许多世纪中曾经有过远东高度的农业文明)以及满洲、朝鲜和东亚各岛屿有过各种各样的联系”。

关于旧石器时代，本书着重介绍了年代约当一万五千至一万

年前的奥西诺夫卡文化，并同我国东北的顾乡屯遗址，以及新疆、内蒙古等地的考古发现对比，认为在“邻近的东北、辽东和朝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应当有过与奥西诺夫卡文化有亲缘关系的远古文化”。

作者在本书中指出：“滨海新石器时代和阿穆尔河（指黑龙江）沿岸新石器时代一样，与邻近的中国北方首先是与东北的同期文化有许多相同点。这说明远东古代部落很早以来就同东亚的其他民族有着亲属关系，并同他们发生文化联系。”书中详细介绍了黑龙江下游的捷丘贺遗址，又引述辽宁锦西县沙锅屯遗址的材料，认为“沙锅屯洞穴对于研究滨海及阿穆尔河沿岸新石器时代居民同东北新石器时代发生联系的历史具有特殊意义”，而“沙锅屯洞穴又证明东北新石器时代同仰韶文化有联系”。谈到南部沿海格拉德卡亚河口等地的发现，书中根据“板岩磨制石刀”等遗物与山东龙山文化类似的情形，认为当地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就“同中国山东地区以至更南部的沿海部落发生了联系”。

本书第四章“贝丘时代文化”，叙述公元前第三千年末至第一千年初的情况，有一节专门讨论“文化联系与古代中国的作用”。作者非常明确地说：“滨海主要的、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业无疑是溯源于邻近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国是东亚最古老、最强大的农业中心。”又说：“东方畜牧部落中冶金业和铸造工艺在很早时期就达到了繁荣阶段，这与其说是取决于他们同西方部落的接触，不如说是取决于同中国的联系。”该节从石器、骨器、陶器和居住建筑等方面，讨论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至殷代文化对滨海地区的影响，分析了单砣子、城子崖等遗址的情况；反复强调：“在千百年中，中国的先进部落对远近四邻有着进步的影响。”“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中国是强大的文化中心，其影响遍及四面八方。”作者甚至说：“古代中国居民及其北方邻人的这一切新的文化因素，其发

源地恰恰是中国，而不是北方。”“周打败殷以后，中国同亚洲北方部落及东方部落的联系得到了加强。”

讲到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由石器向金属器过渡”的时期，书中详细介绍了夹皮沟河谷等遗址。作者指出：“这个多层居址的上面几层中，发现了铁器残件，包括中国北方农人今天仍然使用的那种铧或锄。”书中又将夹皮沟河谷等地所出陶器，与辽东地区的战国随葬陶器对比，认为二者之间，“不仅彼此相似，甚至完全相同”，因而“应当有直接的亲属关系”。由此说明，“从辽东到滨海及阿穆尔河地区，……所有这些部落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周秦以至汉代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当地更快地达到较高的文化和经济水平”。

“关于远东诸部落公元前第一千年的历史，特别是公元一千年代的历史，可以从中国的文献里得到比较详细的了解。随着远东居民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的发展，中国文献的报导也愈益充分而丰富。”这是作者当时并不回避的客观情况。本书对于有文献资料可寻的历史阶段，大量引述我国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例如：《国语·鲁语下》关于武王克商后，“肃慎氏贡楛矢石砮”，以表臣服于周的记载；《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关于两汉魏晋时期的挹娄（有时仍被称作肃慎），从属于中原王朝，屡次遣使入贡，以及挹娄社会经济和生活习俗等方面的记载。书中并且推断，夹皮沟河居址的上层，“应当归属于中国文献中所说的肃慎时期”，先基纳帽居址的中层，“才应归属于挹娄时期”。至于黑龙江沿岸和滨海地区已经进入真正的铁器时代的那些古代遗址，“都应当归属于勿吉或早期靺鞨部落”。

根据历史文献，南北朝时期挹娄改称勿吉，先后臣服于北魏、东魏、北齐等朝，曾多次遣使进献。隋唐时期，勿吉转音为靺鞨，分作七部。书中叙述了这些有关的记载，特别提到唐朝政府在黑龙

江流域广大地区建立一整套行政机构的史实。唐玄宗任命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为勃利州刺史、黑水州都督，又任命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封渤海郡王。渤海称国并自立年号后，势力日渐强大，但其统治者仍接受唐朝封爵，保持臣属关系，借以提高自己在当地的威望。仅大钦茂一代，就曾向唐朝遣使达二十八次之多。书中强调，“渤海的国家机构完全仿效当时中国封建国家的制度”，“渤海文化基本上是从中国吸取的”。同时，书中还具体介绍了渤海都城的平面布局、建筑结构、鸱尾和瓦当纹饰，以及其他各种遗物的特点，明确指出它们同唐代文物一致的情形。

随后，本书又根据中国史料，详细叙述契丹和女真在我国北方先后建立辽、金王朝的历史，以及辽金时期“滨海”地区的物质文化。末了讲到明朝永乐年间在黑龙江口设置奴儿干都司，亦失哈奉命多次前往巡视，亦失哈在当地建立的永宁寺和两块碑记，以至清朝由宁古塔将军和盛京将军接受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部落的贡赋，等等。

但与此同时，书中也还流露出不少明显的错误观点。这主要是故意把汉族和我国少数民族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汉族才是中国人，少数民族都不能算中国人，硬说“渤海对中国皇帝的依附，从来没有超出形式上的册封”，“契丹人（辽）和女真人（金）的历史”，“本来就不是真正的中国史”，拒不承认我国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已经有效地管辖着黑龙江下游和“滨海”的广大地区。与此同时，作者还片面夸大当地民族文化发展的独特性。他说：“阿穆尔河下游……的艺术风格具有最纯粹的、自成一体的性质”，“考古发掘表明，这种风格早在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即已存在，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从而否定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在全书的末尾，作者大肆宣扬所谓“十七世纪俄国新土地发现者”的历史功绩，说什么“正是俄罗斯人迎接了把这片富饶的、被历史遗忘了

的疆土从千百年的落后状态中解放出来的任务”。这些违背历史真实的叙述是完全背弃列宁关于沙俄侵华的光辉论断的。

顺便指出，奥克拉德尼科夫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有许多错误之处。例如，他把秦始皇铸钟鎔金人说成铸佛像，把周公辅成王说成周朝有个名叫公辅的人称了王，把作为《三国志》组成部分的《魏志》与《三国志》并列，把李谨行为积石道经略大使说成李氏修筑一条石路并妄加议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尽管如此，本书作为我国东北边疆考古研究的一份资料，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作者在书中引用的我国历史文献资料，译者都核对过原文，凡是用错这类材料的地方，已在译注中指出。

目 录

引言	(3)
第一章 远东考古学遗存研究简史	(7)
第二章 人类的早期遗迹	(34)
第三章 滨海的新石器时代	(60)
第四章 贝丘时代文化	(107)
第五章 由石器向金属器的过渡(公元前 七至二世纪)	(192)
第六章 鲜卑部落和渤海国	(224)
第七章 女真国时代	(269)
作者、著作译名对照表	(385)
杂志、期刊译名对照表	(394)

目 录

引言	(3)
第一章 远东考古学遗存研究简史	(7)
第二章 人类的早期遗迹	(34)
第三章 滨海的新石器时代	(60)
第四章 贝丘时代文化	(107)
第五章 由石器向金属器的过渡(公元前 七至二世纪)	(192)
第六章 鞑靼部落和渤海国	(224)
第七章 女真国时代	(269)
作者、著作译名对照表	(385)
杂志、期刊译名对照表	(394)

引　　言

远东的疆域，北起楚科奇半岛海岸，南达朝鲜边界；东濒白令海峡，西抵科累马河。

我国远东的过去，远东不同部落、不同语言的居民的历史道路，自古以来就受到俄罗斯和国外学者的注意。使人感兴趣的，首先是研究这部历史，可以明显地看到，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怎样在当地的具体条件下以特有的方式反映出来，看到几千年来，远东居民怎样在这里创造并发展了他们独特的文化。

远东诸民族的历史道路的特点及其文化的特异性，在许多方面，是由作为这些民族的生活条件和背景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的。

苏联远东的海岸，濒临两个大洋和三个大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和日本海；在远东的土地上，奔流着亚洲最大河流之一——阿穆尔河。^①

这里，东西伯利亚的北方景观同满洲、朝鲜的南部景观“相交错”。远东的北陲，是北极的荒漠和冻土带；南部则茂密地生长着满洲类型的喜暖植物。两种迥然不同的自然界——南方和北方，在阿穆尔河沿岸和乌苏里大森林中都能见到。在这里，满洲的胡桃同雪松、冷杉共生，青竹与白桦并茂，葡萄攀藤于云杉。在老虎刚刚走过的地方，竟可以看到北方森林中生活的驼鹿。

这种兼有南北特点的自然环境不能不在远东古代居民的生活中留下痕迹。

地理条件的多样性、大自然的富饶，这一切自古以来就促进了

^① 即黑龙江。——译者

远东古代居民特殊的多种经济和各种文化的发展。

远东居民古代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历史命运的复杂性，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历史条件，取决于他们同邻近的亚洲大陆各地和各国的联系。

远东诸部落首先同中国（它在许多世纪中曾经有过远东高度的农业文明）以及满洲、朝鲜和东亚各岛屿有过各种各样的联系。他们同亚洲中部（旧大陆最发达的游牧文化的故乡）即外贝加尔地区和蒙古也曾有过交往，并经由这一带同西藏接触。他们还同北方地区海洋上和森林中的渔猎人、同冻土带和森林冻土带的养鹿人互相往来，这对于远东的历史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北方部落曾进入南方，南方部落也入居北方；他们的文化互相影响。

这一切都不能不影响到经济发展的性质和方向，影响到历史发展的速度，并且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经历和居民成分，影响到远东诸部落部族的互相关系。

因此，远东的民族史与文化史就显得相当复杂。它不仅关系到亚洲（包括北亚、东亚）民族史的重大问题，甚至也牵涉到美洲大陆民族史的重大问题。

我国远东地区首先是与通古斯-满洲诸民族的经历密切相关的。这些民族现在分布于从萨哈林岛^①到科累马河、从太平洋到叶尼塞河之间的地带；他们所起到的显著作用并非局限在北亚和东亚的政治史与民族史上。正如许多学者所见，通古斯-满洲诸民族的故乡，或在现今东北，或在阿穆尔河上游和中游地区。北亚诸部落的另一个民族大集团（不少研究者把它作为整个北亚广大地域远古居民的苗裔）是亚洲东北部的古亚细亚人。其中基里亚克人至今仍住在阿穆尔河流域；其他的古亚细亚部落（楚克奇人、科

^① 即库页岛。——译者

里亚克人、尤卡吉尔人)则与他们相邻,住在北方的白令海峡地区。

同远东上古史关系至为密切的,还有一个阿依努人(айны)的问题,这是太平洋地区民族史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

人类最早定居美洲大陆的问题也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

正是在这里,沿太平洋海岸,朝白令海峡和阿拉斯加的方向,或者是经过阿留申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曾经有过远古时代的通行路线,美洲的最初居民当是沿着这些路线来到美洲的;他们是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至少是其中主要的一支。

有根据认为,这种同我国远东有某种关联的亚洲—原始美洲的联系,在较晚的各个历史阶段中也仍然有过;这可以从北美诸部落同西伯利亚东北部古亚细亚人文化上的相似点得到证明。根据这一点,西伯利亚东北部的古亚细亚人甚至被人称为“美洲人种”。当然,决不能因此而断言科里亚克人、楚克奇人和伊特里门-堪察加人必定是从美洲来到西伯利亚的,但美洲大陆和北亚居民之间的古代相互联系却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很自然的。

学者们对远东历史之所以产生兴趣,远东古迹之所以具有意义,还由于早在公元头一千年,即大约十二个世纪之前,这里便出现了阶级社会、地方国家组织和高度文化;而在邻近的西伯利亚东部和北部,当时却仍然是前阶级社会,保留着原始公社制度。

在远东各地区的历史上,苏联的滨海是至关重要和最有意义的地区之一。

正是在滨海边疆区境内,最强烈地反映出我国远东的自然、文化和历史发展的一切特征。

在远东的南部,从石器时代开始,便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

渤海人和女真人的国家就是在这里产生和发展的,它们在整个远东的文化史与政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滨海史上阶级社会和国家出现以前的各阶段，即后来渤海人和女真人赖以勃兴的历史基础，对于我国远东史学家同样是值得注意的。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综述滨海这一长期过程的概况，并主要根据考古资料，根据最新研究成果，来阐明滨海居民的历史道路。

本书的对象，不仅是史学专家和考古学家，而且包括对远东的过去，对我国这一片最为遥远的美好的边疆的历史命运感兴趣的所有的读者，以及对这一地区从内心感到关切的每一个苏联人。

第一章 远东考古学

遗存研究简史

十六一十七世纪西伯利亚的开发，促进了俄国的科学首先是地理学的发展。随着这个广袤地域的地理研究的开展，人们逐渐了解到西伯利亚为数众多的部落和民族，了解到他们的历史命运。

关于这一片在“石带”^①之外的遥远而朦胧的地域，早在最初的报道中便描述过西伯利亚古代居民遗留下来的城市废墟和墓葬。

远在三百年前的十七世纪，俄国人便注意到西伯利亚的古迹古物，其中就有远东的考古遗存。

最有意义的一个发现是与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杰出的俄国学者谢苗·乌斯季诺维奇·列麦佐夫的活动有关。

1701年1月1日，列麦佐夫在托博尔斯克完成了一部使之名垂青史的地理学巨著——《西伯利亚地图集》。

在这本地图集的大量资料中，有一条稀罕的、内容费解的标注。在《西伯利亚城市与地域》这幅综合图上，在阿穆尔河的入海处标着：“马其顿·亚历山大王到此，藏以兵器，并留钟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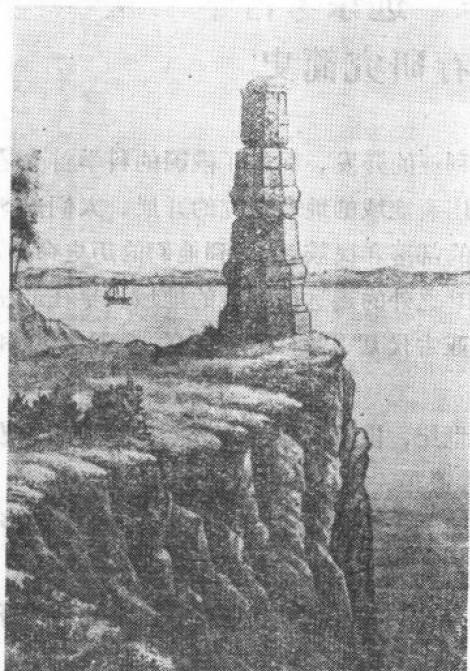
标注附近，标出一座带望楼的城廓，并绘有一物，显然就是标注里所说的那口钟。

原来这条标注说的是著名的特林石崖。1655年冬至1656年，俄国哥萨克人到过特林。他们在这里见到了一座古寺的废墟，发现几块刻有四种文字的石碑。二十年后，他们把这一发现告诉了

^① 指乌拉尔山。——译者

十七世纪著名的俄国旅行家和外交家 H. 斯帕法里。

后者写道：“二十年前，我国哥萨克人曾在阿穆尔河畔及河口与中国人交战。据他们所称，自阿穆尔河口上溯二日之遥，在一处



图一 特林石崖上的石柱。

(Г. М. 彼尔米金绘)

象是从悬岩上开掘出来的地方，发现中国钟一口，钟重二十一普特^①有奇。又发现中国碑文三处。异邦人告知我哥萨克人，古时中国某王曾几度自中国经海道至阿穆尔河，留下文字及钟，作为标志，以资纪念。”¹

这样，我国勇敢的新土地发现者们，十七世纪中叶到达大洋沿岸的头一批俄国人，便在远东考古学的历史上写下了第一页。

出色的特林文物尽

管如此强烈而深厚地引起了十七世纪俄国新土地发现者和十九世纪前半叶旅行家们的兴趣，然而到了后来，它们却在另一些同样动人的、但为数更多、为时更早的我国远东古代遗存面前显得逊色了。

这些遗存的发现，是一批俄罗斯旅行家和学者的功绩。他们

1 H. Г. 斯帕法里：《亚洲与中国》，喀山，1910年，第68—69页。

① 1 普特=16.38公斤。——译者